

民国杭州国学

张凯 / 著

民国杭州研究丛书

杭州出版社

民国杭州国学

张凯 / 著

杭州出版社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重点课题

民国杭州研究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杭州国学 / 张凯著. —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80758-870-2

I. ①民… II. ①张… III. ①国学—研究—杭州市—
民国 IV. ①Z126.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3686号

民国杭州国学

张 凯 / 著

责任编辑 陈晓蓓 夏斯斯
装帧设计 杭州乾嘉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6楼)
电话: 0571-87997719 邮编: 310014
排 版 杭州真凯图文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63千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8-870-2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民国杭州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孙忠焕

副主任 赵光育 熊恩生 宋 涛 袁成毅 王利民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新德 陈江明 张学继 项文惠 夏卫东

倪素浓 陶水木

主 编 孙忠焕

副主编 宋 涛 袁成毅 王利民

总 序

民国时期是我国纷繁错综之秋，杭州和其他城市一样，经历了革命、发展、抗战、内战和解放的历程，在历史风云的挫折蹒跚中开始了近代化的发展道路。民国杭州是这一时期我国政治经济版图上的重要城市，涌现出了众多知名人物，也发生了不少举国瞩目的大事。

1911年杭州光复，结束了清王朝在浙江的统治，随后不久杭州又成为新旧军阀统治浙江的据点和中心，相继建立了政权。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杭州顺应民主和时代的潮流，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辛亥革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激发了他们投身近代民族工业的热情，在杭州以丝织业为主的轻工业有了迅速发展，并开辟了城站新商业区和湖滨新市场，形成了都市新的商业格局。受革命思想的激励，杭城出现不少近代报刊，为积极传播各种新思想、新文化发挥了作用；随着近代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各式新式学堂纷纷建立；浙江图书馆的创办更是杭州乃至全省文化事业中的一件大事。这些变化与发展进一步推升了杭州在全省的地位、在全国的影响。出于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光复后杭州开始拆除钱塘门至涌金门的城墙以及剩余旗营，进行大规模的城市道路建设。这项计划打开了封闭的城市空间，加速了杭州城市空间变化。屏障拆除之后，西湖便融入城市之中。这样，西湖从郊外

景色转变为城市景区，用当时杭州居民自己的话来形容：“西湖搬进了城。”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改革地方建置，浙江省政府划杭县所属城区和部分郊区设立杭州市，组建市政府，奠定了杭州作为现代城市的基本框架。杭州建市后，各项事业迅速发展。1929年，浙江省政府为了“奖励实业、振兴国产”，即在杭州举办了首届西湖博览会，促进了工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本次活动盛况空前、影响深远，是近代以来中国内地举办的最大规模博览会，被誉为中国会展业的开端。以西博会为契机，杭州开始了近代城市建设，城市外围交通路网相继建成，市政设施建设全面启动，公共汽车、自来水厂和电厂等城市公用设施应运而生，改善了市民的 living 环境。这一时期，杭州是东南地区农产品的集散地和工业品的中转地。伴随新兴商业街区的形成，杭州商贸日益繁荣，金融业更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随着社会发展和市民生活的需要，出现了戏院、电影院、体育场等近代文体场馆。旅游业快速发展，国内游客每年达百万以上；除政界要人、富商大贾、文人雅士频繁来杭外，也不乏来自外国的游客。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杭州，杭州进入八年沦陷时期，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就此中断。在日伪的统治下，杭州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工商业受到重创，大批学校迁避他乡，文化教育设施和名胜古迹被大量破坏。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杭州与全国其他城市一样，获得了一个发展的重大机遇。杭州的工商界人士筹措资金准备大干一场。但是，重大的发展机遇转瞬即逝。由于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惊人的战争费用，导致政府滥发钞票，引发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金融崩溃。杭州的近代化进程再次遭遇重大挫折。

1949年5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杭州城。杭州的解放，使杭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纵观民国杭州这段历史，尽管近代化的进程艰难曲折，但成果还是显著的：杭城逐渐向近代型城市转变，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空间布局日趋完善，工商业有较大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更是迈进了近代社会。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由于民国时期的执政者不愿也不敢去触碰封建的土地制度，所以那时的发展是畸形的，广大的农民生活没有多大改善。

历史证明，社会的发展一般是以螺旋式上升的形式进行。杭州在民国时期的发展也是如此，它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我们解读城市的历史，除了溯源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外，应将城市放在历史的坐标上综合对比研究，从中寻出历史发展的轨迹。

历年来，杭州市政协非常重视对民国杭州历史文化的挖掘与研究。除征集、出版大量民国“三亲”史料之外，1997年6月由第四届杭州市政协主席周峰主编的《民国时期杭州》正式出版，填补了民国杭州史研究的许多空白。2009年11月，杭州市政协文史委、杭州文史研究会会同民国浙江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民国杭州研究学术论坛”，省内外80多位专家学者对近代化进程中的民国杭州历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2010年9月，杭州文史研究会与市社科规划办合作，推出了“民国杭州研究”重点专项研究招标课题。经过专家评审，有20个项目获得正式立项。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民国杭州研究丛书”，即是“民国杭州研究”专项课题的成果展示。总的来说，这套丛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内容全面。丛书涵盖了民国杭州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二是体现了历史研究的新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等成为史学研究的热门领域，这个特点在这套丛书中也得到了体现。三是具有强烈的问题意

识和当代意识。丛书各作者期望通过对民国杭州历史的研究来为当下杭州发展的实践服务。

在这套研究丛书推进的过程中，杭州文史研究会始终坚持严要求、高标准的宗旨，从具体每一部书的研究思路到写作提纲再到成稿，都组织民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严格评审，各位作者根据评审意见数易其稿，不断完善。所有这些，都为了力求达到一个总的目标：要使这套民国杭州研究系列专著在学术上能够经得起检验，在一定时期内体现民国杭州研究的最高水平。至于是否达到了这个目标，有待于各界人士的评论指正。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套民国杭州研究丛书的推出，必将对以后的民国杭州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今日杭州是历史杭州的传承和发展。民国时期是距离现在最近的一个历史阶段，对这个历史时期的纵深研究，不但大大丰富了杭州的历史文化，而且其所揭示的历史轨迹能够为当前杭州经济、社会、文化和城市建设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借鉴，也可为杭州的科学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孙忠焕

2011年7月于杭州

目 录

总 序	孙忠焕	001
引 言		001
第一章 新旧转承：浙江教育会与清末民初浙江学界		008
一、浙江教育总会之成立		009
二、“木瓜之役”与新旧分水岭		018
三、“新知”与“国粹”		028
第二章 薪火相传：之江大学的国学研究		045
一、民初之江大学的国学教育		046
二、20世纪30年代的之江大学国文系		053
三、国难时期的勉力经营		075
第三章 国学的提高与普及：陈训慈与浙江省立图书馆		088
一、南高后劲与浙东史学		089
二、阐扬文献与化导青年		099
三、浙江文献展览会		108

第四章	沟通文质：国难之际浙江大学学术转型·····	123
一、	“办大学者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	125
二、	东南旧人·····	129
三、	国文之争与导师制·····	133
四、	“求是”校训·····	144
第五章	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浙江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	158
一、	新史学的追求·····	159
二、	新旧与中西·····	177
第六章	“六艺统摄一切学术”：马一浮的国学思想及其实践·····	197
一、	学术三变与儒学再兴·····	198
二、	六艺与国学·····	206
三、	分科与判教·····	213
四、	大学与书院·····	228
第七章	复兴浙学的尝试：余绍宋与重修《浙江通志》·····	250
一、	机构沿革·····	251
二、	发扬浙江文献·····	257
三、	《重修浙江通志》之编纂·····	261
参考文献	·····	271

引言

梁启超曾言：“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1]近代是否为一“文化昂进之时代”暂且不论，然近代能称为学术思潮者必有以整理国故运动为中心的国学研究潮流。从1902年梁启超筹办《国学报》，到20世纪50年代初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合并或停刊止，近代国学讨论持续了半个世纪。^[2]清末民初，中西学战、国粹与欧化论辩之时，学界开始重新梳理传统学术，区分国学与君学。清末民初的“国学”观呈现出一种超越儒学的有意倾向，所谓“以儒术为国学者，名不称实之举也，朕即国家之学也”。^[3]新旧学人多参照西学分科整理中学，清末知识界实践“欧风变转学术新”风气的同时，以国学激发种性在海内外蔚为风潮。1902年，梁启超提出：“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4]1905年，邓实创办《国粹学报》，发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

[2]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3] 孙叔谦：《国学：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第1卷第4期，1914年11月。

[4]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第120页。

明国学，保存国粹，倡导：“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1]《民报》曾刊登《国学振起社广告》，自称：“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2]民元前后，老辈学人纷纷成立国学研究机构，以期传承学脉。廖平、吴之英、宋育仁、谢无量、刘师培等人创办四川国学馆；章太炎及其门生先后计划在杭州、北京组建国学会；罗振玉、王国维发行《国学丛刊》。

新文化运动之后，学术界以复古为解放，进一步引入新知，以西学为准则重新估量中华文化的价值。1919年，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系统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声称：“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3]1923年1月，胡适进一步强调国学就是以系统与比较的方法研究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南京东南大学的学衡派以归国留学生为核心，主张昌明国粹、融化心知，与胡适等人争辩输入西学的正统和研究学术的纯正。该校国学研究会提出“以科学理董国故”或“以国故整理国故”，而反对胡适所倡导的以“科学方法”统领整理国故的一切领域。胡朴安创设国学研究社，一面收吸新潮文化，一面整理国学，弘扬传统文化。虽然各派学人对“整理国故”见解各异，但都坚信“整理国

[1] 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1906年8月。

[2] 《国学振起社广告》，《民报》第8号，1906年10月8日。

[3]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351页。

学之声，洋溢于耳，国学终有复兴之一日，不过整理方法，颇费斟酌耳”。^[1]

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科学史学派对待国学的态度，基本上已经扬弃了原有保存国粹的固有心理，提倡国学不再是为了阐扬民族精神或保存传统文化，对他们而言，整理国故是为研究历史，所以他们把泛涉一切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在内的“国故”都看作提供学术研究所固有的材料，以西方学术分科整合中国传统学术成为学界主流。许啸天认为要使国故成为学问，就需要以西方学术分科与历史的观念“把一个囫囵的国故学，什么政治学、政治史、社会学、社会史、文学、文学史、哲学、哲学史，以及一切工业农业数理格物，一样一样的整理出来，再一样一样的归并在全世界的学术界里，把这虚无飘渺学术界上大耻辱的国故学名词取消”。^[2]曹聚仁也认为：“国故一经整理，则分家之势即成。他日由整理国故而组成之哲学、教育学、人生哲学、政治学、文学、经济学、史学、自然科学……必自成一系统而与所谓‘国故’者完全脱离。”^[3]总之，国学不再被视为不可动摇的学术之本，也使得当时倡言国学者自如地接纳西方视角，以西学的眼光重新诠释传统学问。

20世纪30年代，国难日亟。学界有人质疑整理国故运动导致中国文化丧失本位，复兴儒学运动蔚为大观，期望以儒学挽救人心、鼓舞民气，发挥儒学在精神信仰与道德修养层面的凝聚力与约束力成为民族复兴的重要凭借。郭斌龢便宣扬新孔学运动。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指出《四书》、《五经》为国学根本，“通经致用”与“整理国故”是研究国学的方针，“所谓国学应当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在内，并不以经为限，但是中国的学问，无一不以经为根据，所以研究国学，当然要以经为首”。^[4]

[1] 胡朴安：《民国十二年国学之趋势》，《民国日报·国学周刊》国庆日增刊，1923年10月10日。

[2] 许啸天：《国故学讨论集新序》，许啸天辑《国故学讨论集》，群学社1927年版，第3—5页。

[3] 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东方杂志》第22卷第4号，1925年2月。

[4] 何键：《要用最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国学》，《国光杂志》第17期，1936年5月。

纵观近代国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有学人将其分为晚清十年、民初一二十年代、30年代到50年代三个阶段。^[1]民国学人以国学研究为中心，融会中西，贯通古今，潜心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新的学术研究范式，各阶段国学研究特别是认识传统学术价值的中心皆有所不同，中国传统学术以多元面貌向现代学科体系过渡。

由于学术史研究逐渐升温，民国国学问题近年来也日益为更多的学者所关注。近代“国学”问题是罗志田、桑兵等学人论述晚清民国学术的切入点，整理国故运动可谓近代学术转承的中枢，罗志田就整理国故运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思想分析的视角，着重讨论了整理国故和“科学”的关联，较详实地介绍了民国学者对“国学”与“国故学”的不同诠释，以此说明“国学”与“国故学”在当时就是受到广泛关注而又充满歧义的概念，并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京沪学人关于“整理国故”的几次思想论争。^[2]桑兵首先探讨了晚清知识界，其后又对晚清民国学术作了通贯的综述分析，再分别以人物（梁启超、胡适、陈寅恪、“老辈学人”、章太炎、傅斯年、金毓黻等）、机构（清华大学国学院、东方考古协会、厦门大学国学院、中国史学会等）、方法与理念（“道统与派分”、“新史学”、“史学即是史科学”等）为中心展开论述，通过呈现中国近代学术传承中复杂纠葛的“学”“人”“事”，对晚近以来“分科治学”、严辨“中西新旧”等学风予以切实的纠正，特别是对民国学界老辈的研究，质疑了以新文化派叙述编成的民国学术史，也将“国学研究”一题，从地域、人物、议题等方面拓展到新的领域。^[3]海峡两岸均有承二人之风而起者，陈以爱首先对整理国故运动的核心机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做了系统与深入的研究，而后又考察了整理国故

[1] 马克锋：《近代国学的历史考察》，《国学学刊》2009年第1期。

[2]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争论》，三联书店2003年版；《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版。

[3] 具体研究成果多收入其近十年来出版的三本著作中：《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版。

运动由形成至退潮的全过程，并从学理上对整理国故的诸多理念有所澄清。^[1]与之同时，卢毅对“整理国故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进行重新解读，以若干重要事件、文献为标志，尝试着将“整理国故运动”在民国学界的演进历程，初步划分为兴起、高涨、分化、衰歇等四个阶段，并分别予以概述，进而探究其兴衰递嬗的原因；最后，在通盘梳理“整理国故运动”学术渊源的前提下，较为系统地阐述它对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重大影响。^[2]

综观以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学研究，大多集中于“整理国故运动”，且关注对象多为北京、上海、南京等民国学术中心的学术机构、学人与学术。

杭州作为晚清学术思想文化的重镇，因为社会、时代变迁，虽不是民国学术转型的中心，在民初整理国故运动中并未引领时代潮流，但杭籍、浙籍学人却一直是全国学术的中坚力量。目前关于民国时期杭州国学研究的成果侧重于章太炎、马一浮、陈训慈等学人的个案研究。本文拟在近代学术转型的背景下，对民国时期杭州国学研究的渊源流变，作一系统梳理，以此展现杭州乃至浙江学术在近代学术转型过程中之位置。

一如有学人称，在近代学术史研究的范畴内，史料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一、学者论著：主要为专著和文集；二、传记资料：包括日记、来往书信、自传、回忆录；三、公家及私人档案；四、报刊：包括杂志、学报及报纸副刊。^[3]近代学术转型的一个重要媒介就是学术刊物以及与之配合的新表达方式的出现，专业期刊与现代的学术论文相互依托，笔者尽量查阅、研读大量晚近报刊资料，与档案、日记、书信、回忆录相

[1]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修订本），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行》，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研究部2002年博士论文。

[2] 卢毅：《“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03年博士论文。

[3] 陈以爱：《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行》，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研究部2002年博士论文。

互补充印证。以近代学术与教育体系变迁为背景，考察民国时期杭州学界重要的国学组织、学术机构、学人及其活动，估量杭州学界在全国学术版图中之地位。以此为基础，揭示民国杭州国学研究的具体内涵及其社会影响，呈现杭州与国内学术重镇风气转移的关联与学风融会，窥测新旧学术范式的转承。

清末新政时期，浙江教育总会成立，以开启民智与提倡合群为宗旨。然而，该会成立伊始，即受制于“区域主义”，纷乱不止。因地缘、学缘激化而成的“木瓜之役”成为浙江新旧文化分化的分水岭。

民初，浙江教育总会改组，会长人选的更替预示浙江教育总会在“国粹”与“新知”之间的选择，改组而成的浙江省教育会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五四之后，浙江省教育会徘徊于新知与国故之间，浙江高等教育衰落，在如火如荼的整理国故运动中，杭州逐渐被全国学术潮流所边缘化。

北伐前后，随着非基督教运动的深入，之江大学加速了去“宗教化”与去“西洋化”进程，中国文化研究逐步受到重视。20世纪30年代，在钟泰的领导之下，之江大学国文系发展成为杭州地区国学研究的重镇。与此同时，陈训慈主持浙江省立图书馆，整理编目，增进阅览，征存文献，整理庋藏，刊行报刊，辅导各图书馆，以期导扬学风，建立浙江学术重镇，以兹于增进民族文化、复兴民族精神。

为振兴浙江学风，陈训慈等浙籍人士引介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竺可桢掌校之后，改革教育理念，发展文史学科，调整学科结构与人员组成，浙江大学学术风气为之一变。为调和各院系间的分歧与矛盾，竺可桢提出以“求是”为校训，升华“求是”精神，以此平衡文实冲突，倡导科学人文化。

国难之际浙江大学的学术转型，旨在扭转“物质主义”风气，力求融汇新旧，沟通文质，开中国文化之新途径，以此为通才教育之先导。浙江大学史地学系志在实践“今日吾国人所需之新史学”，中国文学系则肩负着“天下来同”的使命感，实现中西并蓄，发扬中国文化。相形之下，马一浮提出“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以判教取代分科，整合中国

传统学术，期望复性书院以六艺之教造就士子，为社会文化之一端，传承绝学。

余绍宋与浙江通志馆希望借助重修《浙江通志》，复兴浙学，发扬浙江精神。1949年，重修《浙江通志》一事中辍。1950年，复性书院改设智林图书馆编纂处，寓意革新之际，“通天下万物之志”，研究世界文化，适应时代之宜。至此，复兴浙学，发扬中华文化，以期融汇中西、天下来同的宏规仅能留待后来人。